

《二十一世紀》三十年來的變遷

梁元生

《二十一世紀》雙月刊創刊於1990年10月，每年出版六期，至今剛滿三十年，已經出版了一百八十期。在這期間主編經歷數變，創刊時是劉青峰，前面十多年她負責編務，聯繫作者，構思主題，為《二十一世紀》打好基礎，建立名聲，應居首功。青峰退休之後，由顧昕及余國良繼任主編之職，保持刊物原來風貌，主要仍然刊發以「百年中國」及「文化建設」為主題的思想性文章。近數年的執行編輯是張志偉，因着學術界評核的要求把部分文章匿名外審，作者群也繼續涵蓋大中華地區及海外華人學者。

回顧這三十年中，元老們雖然有些已經退隱，但有些仍然不懈地為本刊繼續寫作，例如創刊號中的金耀基教授和李歐梵教授，仍有為本刊執筆。當然，現在《二十一世紀》的作者群的背景更為多元化和年輕化，這是個好現象。反觀這份刊物最為穩定不變的，是它的工作人員（編委、編輯、設計、校對及排版等）。這些員工絕大部分是早期就參與《二十一世紀》工作的。他們在這二三十年來，日復日、年復年勤奮不懈地為這份刊物勞碌工作，尤其是在近期新冠肺炎（COVID-19）疫症期間，不憚兇險煩勞，使刊物能如期出版，故此我想藉此機會向這些敬業樂業的員工表示衷心的謝意。

至於《二十一世紀》的主題和方針，那是由一批編委定期討論而制訂出來的，向來是定期齊集於香港中



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的澄軒，對每期的出版提出檢討和意見；疫症期間大家就只有作線上討論了。而這群編委之中，對《二十一世紀》這份刊物最為關心而且貢獻最大的，當推陳方正博士。他是《二十一世紀》的創辦人，自1986年起擔任中大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。「六四」之後他與從內地來港的學者金觀濤、劉青峰伉儷在中國文化研究所創辦《二十一世紀》雙月刊，並設立「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」。方正兄創辦這份思想性雜誌，希望透過學術的討論、思想的衝擊，一方面回眸歷史（「百年中國」），一方面展望將來。他們在1990年代以中大為基地，以《二十一世紀》為平台，呼朋嘯侶，串連海內外中國知識份子，為建設二十一世紀中國文化建言獻策和鼓勵改革。

在世紀轉換前的十年，《二十一世紀》很能夠代表着一股學術的清流、改革的強音，吸引許許多多關心中國變化的有心人。進入二十一世紀後，注目中國社會和文化改革的中文學報和雜誌增多了，但在世紀初的幾年中，《二十一世紀》仍然是許多中國知識份子喜歡閱讀的刊物。直至第三個十年，由於世界和中國的急劇變化，它的影響力才顯出有逐漸減退的跡象。經過三十年的變化之後，在紀念《二十一世紀》創辦三十周年之時，重讀方正兄的發刊詞〈為了中國的文化建設〉，仍覺心神激動，感受強烈。在過去的三十年中，世界、中國、香港和個人都有很大的變化，但《二十一世紀》猶如疾風中之勁草，創立的初心未改，方針未變，而它的內容、主題、風格和設計，仍然保持原來的主調和路線：既回顧歷史，也向前瞻望；它鼓勵多元的角度、不同的聲音與包容的態度，為這個變動中的中國社會發展和文化建設，提供一些可供思考的材料和意見。在這一點上，我們仍在堅持；而我們所以有此堅持，實賴編委會成員討論之後得到的共識和集體的努力，其中最重要的支持者，就是與本刊同行三十年的陳方正博士。方正兄退而不休，老當益壯，仍然不斷地為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和《二十一世紀》貢獻心力和時間。我繼承方正兄成為《二十一世紀》的出版人，也擔當過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及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之職，對方正兄創刊的初心和一直以來的努力，有一定的認同和深刻的體會。在此也要藉創刊三十周年紀念的時刻，特別向方正兄表達我的敬佩和感謝。

在近現代中國的歷史中，經歷過不少個風雲詭譎、變化多端的三十年。但剛過去的這三十年，亦即是《二十一世紀》所經歷過的三十年，卻是相當特別的三十年。這三十年和以前的一些三十年一樣，都充滿了日新月異和翻天覆地的大變化。然而，剛過去的三十年的大變，與過去的變動有着本質上的差異。以往的變化或追求變化的動力，在於不滿現狀，在於怨氣難平，在於對戰爭、鬥爭、專橫、豪奪所帶來的混亂和恥辱，以及普遍貧窮和社會不均所帶給人民的無助與痛苦，而產生的求變和改革之心。這種激憤和忍辱之氣，自鴉片戰爭之後，便成了關心國家社會的知識份子尋求改革的動力，而目標就是振頹起蔽，國富民強，一洗外侮帶來的恥辱和貧弱帶來的困苦。但

爲了中國的文化建設

陳方正

在本世紀，中國人心裏曾多次燃起希望的火炬。可是，暴風雨使它不能持久，一次又一次地風動、閃爍，終告熄滅。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的時候是這樣，到了今天，在改革開放運動已經推行十年之後，也還是這樣。中國，有這樣悠久文化傳統，這樣優秀人才和龐大活力的中國，又再一週遭挫折，陷入危機之中了。

爲甚麼會這樣？爲甚麼中國總是在改革和停頓之間游移，不能邁步前進？一年多以來，這些問題困擾着許多同事、朋友和我自己。蒙週國樞、鄧之宏、我們屢次議論，反覆爭辯，摸索出路，同時，像多少前輩知識分子一樣，真正感到了作爲中國人的焦慮與沉重心情。

在我們看來，近百年間，中國現代化的過程波折重重，其中原因固然很多，有關於本質和主觀意志的，也有取決於機緣或者艱難條件的，不一而足。但總的來說，建立新文化的決心和努力不足，恐怕是相當重要的一個因素。的確，近代中國曾多次出現新思想的萌芽。但是，在迫切的現實政治目標籠罩下，它們喪失了自主性，或缺乏灌溉和培育，無從發榮、滋長。更談不到成爲覆蓋神州大地的觀念。現代化是一個長期和根本的變遷過程，只有在社會已經進入了新的觀念、意識、行爲模式之後，它才有可能穩定和持續地進行。在這之前，戲劇性的突破固然令人興奮、鼓舞，但那不過是子夜的篝火而已，倘若因而誤以爲長夜已盡，晨曦即將來臨，自然是不免一再感到失望的。

所以，中國今日的問題雖然千頭萬緒，有種其迫切，極其實際的一面，但是深入的、整體的長期文化建設，仍然是知識分子的基本和重要責任。

我們這樣說，絕對不是忽視科技、管理、醫學等專業知識，和工業、交通、運輸、城市建設等物質條件，更不是認爲，現代化可以憑藉抽象觀念來實現。然而，把現代化的努力局限於實際的層次，以現代化的具體表徵——彩色電視、噴射機、火輪等等——來代替它的思想、觀念，那恐怕也是錯誤的。這不單單因爲現代社會的制度有賴於許多深人人的抽象觀念——自由、平等、人權、契約、民主、法制等等——更因爲所謂「現代」，從下層的技術、產品，以至上層的知識、經濟結構、社會動

力，都是不斷地急劇變化的，對今日的中國來說，不但有關社會制度的種種外來思想有待開揚，而且，經常接受新事物，經常適應和促進變化的心態、能力，也急需培養。否則，從先進國家移植過來的知識、技術，轉瞬就會落伍，甚或當前就會受到原有社會結構的抵制、排斥，不能充分發展。

明治維新年間，日本能夠在貧乏的物質條件下，徹底改革政治社會結構，一躍而爲東亞霸主，那和它領導層向西方學習的強烈意識，以及堅決的革新精神，是分不開的。十月革命之後，蘇聯一心意在科學、技術、工業等現實領域追求發展，不遺餘力，並且獲得了令人注目的成績。然而，它遲遲終於癱瘓了！固定不變的體制表面上帶來穩定，但從長遠說，其實是阻礙進步的，因此，必須不遺餘地放棄、失控的危險，要敢於拋棄新思維，推行全面體制改革。這兩個近鄰的經驗，是值得我們思考和反省的。

這就是我們認爲，必須等到傳統思想模式轉化成新觀念、新心態之後，現代化才能夠穩定和持續地在中國進行的緣故；這也就是我們強調文化建設的緣故。

當然，香港只不過是一個前途尚有待確定的商業都會而已，免不了有人奇怪，我們究竟憑甚麼，來倡言推動建立新的中國文化。其實，我們所擔負的，只有兩個簡單的信息：第一，在現代，一個民族的進步，最終是要通過智能的發揮和思想的驅動力，也就是說，是要倚靠知識分子的。第二，今日中國知識分子的力量，已經分散到全球各地了。從傳播訊息、掌握動脈、交流意見的角度來看，四通八達、五方雜處，不拘一格的香港，是具備獨特而無可取代的地位的。

在這兩個信念驅動下，《二十一世紀》雙月刊的構想大半年前逐漸形成了；未來的世紀將是一個多元的世紀，我們希望這份刊物也具有多元性格，成爲同時面對全球各地讀者而作者，同時屬於各種不同專業，不同意見的中國知識分子的刊物；我們希望它對中國思潮的驅動力能起些微作用，但決不希望它只作一個聲音呼喊，只依循一個方向前進。它所扮演的角色應當類似一所茶館，一個咖啡室，而不是一間教室、一座演講廳。

這種想法，曾陸續繼續的，先後和中國文化研究所以及大學裏面的同事討論過，五、六月間又則海外跑了一趟，見到不少熟悉的，以及初次相識的朋友。他們的熱烈反應和鼓勵，堅定了我們的看法，使我們深深相信，今日已經遍布全球的中國知識分子，是願意，也能夠，爲建設一種多元的，有前瞻性的二十一世紀中國文化而努力。懷着這樣的信念和希望，我們謹將這本刊物貢獻給中國的將來。

陳方正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

陳方正正在《二十一世紀》的發刊詞中，以「茶館」比喻這份刊物。(資料圖片)

過去三十年的變動，卻標示着大國崛起，走向小康和走向富強的過程。這種國力增強和經濟躍升也帶來社會行爲和群眾心理的變化，並且在政治管理和外交運作方面也帶來重大影響。過去的一個半世紀，大家都在討論怎樣追求「富強」，而新世紀的最大挑戰，卻應該是如何管理「富強」？如何表達「富強」？如何培養富而不驕的「小康公民」意識？或在國際上如何表現「大國擔當」的責任和氣魄？

方正兄在《二十一世紀》的發刊詞中，以「茶館」比喻這份刊物，鼓勵「茶客」(作者和讀者)善用雙月刊這個平台，自由發聲，各抒己見。「茶館」之不同於講堂或教室，是由於那裏容許眾聲參與，甚至喧嘩，而在講堂或教室之中，則只有一把教導和權威的聲音。「茶館」的「茶客」中當然有好發言、聲音大的賓客，但同時也有不少品茶者是沉默的聽眾，一邊喝茶，一邊聽人議論；也有邊聽邊喝，偶爾附和一二句的；更有一邊聆聽，一邊觀看，一邊剝花生和吃蠶豆的人。他們雖然很少發聲，但同樣是「茶館」裏的參與者，是時代變遷的見證人。疫症蔓延期間，茶館和酒吧都被政府要求陸續關閉，因此民間論政的喧嘩之地也愈來愈少了。「課虛無以責有，叩寂寞而求音！」知識份子的清談，許多人都認爲不切實際，而疫症下更禁止交往和喧嘩，在此新常态下我們的「茶館」能繼續開辦到甚麼時候呢？！

梁元生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主任